



香港 · 文化 · 研究

吳俊雄 馬傑偉 呂大樂 編



香港文化研究

香港 · 文化 · 研究

吳俊雄

馬傑偉

呂大樂

編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2006初版
重印2007, 2009

ISBN 978-962-209-786-5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青塔印務有限公司承印

作者自述

吳俊雄

1982年，我到英國深造，研究英國工人階級政治。跟論文老師第一次見面，他問..“除了讀書研究之外，你有什麼嗜好？”我答：“閒時我會讀點Stuart Hall，分析香港漫畫和電視劇的意識形態”，然後向他推介了我在《學苑》寫過關於《變色龍》和香港足球的文章。

我記得老師噢了一聲，然後相對無言，滿室死氣。

往後三年，我愛上了英國，跟老師變成好朋友，我的工人階級研究也順利完成。

1985年回到香港，人生和學術，再上十字街頭。

那時中英聯合聲明已變成白紙黑字，英國人漸退，中國人未來，香港人在尋找自己。我環目四看，香港的工人階級繼續若隱若現，政治在翻新了的殖民管治下堅持進一步，退兩步，能夠撩動人心的竟然是梅艷芳、譚詠麟和我的同窗周潤發。我想起《變色龍》，再讀Stuart Hall，然後發了一場迷戀香港普及文化的大燒，至今未退。

然後我提醒自己，搞文化研究，永遠，永遠要由地道嗜好開始。

個人簡歷：1977年加入“大眾文化行動組”，一邊做調查研究，一邊抗議佳視清談節目《哈囉夜歸人》教壞大人。1977至80年，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開始練習(後來知道是)港式文化研究的寫作。1985年由英國回港，開展對大眾媒介、性別和平民習慣較系統的研究。九七前後，出版《文化拉扯》和《文化再拉扯》，嘗試推廣研究成果，並介入當前社會文化話題。同時期，在港大開辦“香港普及文化”選修科。2001年，出版《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合編)，將過去香港三十年介乎學院論文與普及評論之間的眾多著作，盤點結集。2004年，《文化拉扯三——七情上面篇》出版，繼續發燒。

馬傑偉

三十歲前從未想過從事學術研究，1990年於中文大學修讀碩士課程，才決定轉行加入教研隊伍。猶記起當年李少南老師期望發展傳播研究的“吐露學派”，集結一群志趣相投的學者，立足香港中文大學，面向國際學術同行。當年的碩士論文，題為《香港電視與社會》，後發展為博士論文。畢業返回母校任教，一直以香港文化及身份認同為研究焦點，但香港回歸，赫然發現，中國冒升在視線之內，甚至覺得，以前錯誤地以為可以獨立研究的香港文化問題，不能再被視為一相對獨立的分析單位；以前是研究香港如何排斥中國以建立本土性格，現在發現香港文化演變在於如何在中國巨大的引力之下重新建立本土性格。本書所收錄《市井國族主義》論文，正是筆者從香港本位的研究，轉向跨境文化變遷的嘗試。個人的嘗試作用有限，

關心本土的學者走在一起，或可構成動態的對比參照。多年前“吐露學派”之說，雖是信口開河，但立足本土，集結同道的願景，可借本書的出版邁進一步。

呂大樂

我跟香港普及文化的社會學研究扯上關係，純屬意外。1977年完成大學入學試和上大專前的暑假，跟一班同學及新認識的朋友一起參加了“大眾文化行動組”。同期，去“社區組織協會”當義工，到安置區搞社會行動。當時我對社區組織和社會行動更感興趣。1983年編《普及文化在香港》，一是因為考上港大後參加了學生報《學苑》的編輯工作，對文化批評、意識形態理論有接觸，二是當年各社區、青年中心都開班研討電視文化、大眾文化，極需要一些閱讀材料。就是這樣，跟馬國明一拍即合，書稿交“曙光圖書”出版。我喜歡看電視，在七十年代看過無數港產“爛片”，對街頭文化充滿好奇。但這是個人“業餘”愛好。論研究興趣範圍，其實是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香港社會研究。近期計劃重寫《唔該，埋單！》。

梁世榮

在新著*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的序言中，Paul Ricouer說：“當前的研究來自數個我擺脫不了的東西，有些是個人的，有些是專業的，餘者我最後會稱之為公眾的。”我讀的是社會學，卻越來越愛隱居。本文集內茶餐廳一文，能夠服務社會的，可能是以論文把零散的茶餐廳

資料整合起來，束諸圖書館的高閣，以待來者。其實，愛隱居又想為大眾做點好事，我應該效法高陽，把這些資料鋪敘成小說。如張大春所言：“（高陽）透過一看似的雄辯整體，蒐羅各種容或不出於‘正史’的典故知識來重新建築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經典地位等量齊觀的歷史論述。”當然，鋪陳史料只不過水磨工夫，重現氛圍卻需要大匠斧斤，我有的是一管禿筆。

這篇文章數易其稿，在研討會宣讀的是資料的初步整理，修訂時才發覺，研究問題還沒有調較好焦點。待想通想透了，不少資料又要在新視點下重新鋪排。原因只有一個：過去參與了多起全港性的定量調查，但研究進路和研究方法與本文可謂風馬牛不相及，扯得上關係的只有兩篇有關身份認同的文章。可以說，寫作此文時，專業準備不足。也幸好不足，才不暇理會國際研究趨勢、香港研究潮流，只管在茶餐廳的歷史天地中，自說自話、自成方寸。

寫作本文，觸發點完全是個人的。某天，在書局看到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的漫畫集，買下、回家、細讀，卻不是味兒。找來譯本和評論，再細讀，普氏從一杯茶泡著小瑪德萊娜點心而牽扯出來的龐大回憶，教我也想到了兒時吃的種種。那時候，我就想到要一篇一篇地寫茶餐廳的故事，浮現腦海的第一篇是這樣的：

雞啼啼、狗吠吠，光明街又一個大清早。擦過了臉，接過姊姊的一角錢，就走到街口的德如茶水檔去為她買奶油多士蓋沙糖。“德如”不見了人，只有他老婆頭戴白花，一面沖奶茶，一面把炭爐中烤得金黃的方

包翻過身去。“德如”最愛聽著收音機，和茶客嘻嘻哈哈，碰上足球轉播，“德如”為了駁斥葉觀楫偏幫星島，常常把多士烤焦了——“烤焦了！”只得我一人叫嚷，其他人都靜靜看著，“德如”老婆把多士烤得焦黑了。改用電動多士爐不久，茶水檔依傍的唐樓要拆卸了。新世紀的德如，從新大廈的地鋪茶餐廳延伸到戶外的茶水檔，在烤多士的，不正是“德如”？

那時候，我正翻看卡爾維諾的《意大利童話》。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談“快”之作為文學價值時，他說：“若說我作家生涯的某某階段，曾特別喜愛民間傳奇和童話故事……是因為那些故事的風格、結構、精省、韻律及嚴密的邏輯，令我感到有趣。”

如果羅盤是湖、羅盤針是舟子，我現在是從中年往童年回航；在研究上這是倒退，在文化上卻是生趣。

是為不大像研究自述的自述。

谷淑美

我在這書的篇章中寫香港的婦女運動，其實也在側寫香港的公民社會。2003年7月1日的五十萬人大遊行，無疑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在這之前，我也談公民社會，特別是其中可比擬作文化戰場的公共領域。一直以來，香港的政治想像空間都非常狹小，要討論公民社會或公共領域等概念，總難免給人感覺在攀談西方理論多於觀照本地的政治現實。但畢竟，過去多年來從公共領域和社會運動所積累下來的點點滴滴，雖稱不上碩果纍

彙，但總算是成就了今天的歷史印記。在以往分析香港政治文化的文章裡，我多以一些事件作為聚焦點，嘗試學著去解拆主流論述紛雜的敘事形構，並探究當中不同元素之間所產生的聚合性和不穩定性，看看在政治爭鬥的過程中，一套民主思維能否在本地的土壤上開花結果。民主可以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更是以不同的面貌和我們的文化、想像、政治和生活碰撞在一起的產物。因此，在這探索公共領域的歷程中，我同時發掘了香港身份的歷史，也遇上了香港婦女運動。

這是我第一篇以婦女作為主軸而寫的文章。香港的婦女運動發展雖說不上波瀾壯闊，但它自有其精彩之處及令人動容的地方，起碼它提供了另一種閱讀和實踐政治的角度。說到底，我們的公民社會，不論強也好、弱也好，就是有這樣的一個部份。

個人簡介：畢業於香港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主修社會學，現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亦為耶魯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員。

陳效能

畢業於香港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現職嶺南大學政治及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中學時代於理科班中垂死掙扎，幸好當年某學院有提供社會科學預科課程，救了會考成績欠佳的陳效能一命。在港大修讀碩士學位時，師父是吳俊雄，論文題目是有關香港年輕中產階級對品味的看法；在英國的博士論文則研究香港中產階層邊界符號 (symbolic boundaries) 的內容及應用。在牛津時少不免 (非完全自願

地) 受到量化研究方法的洗禮，導致1997年回港後的研究課題及方法均出現少許兩極化的情況。唯一帶有連貫性的便是研究全都以香港文化及社會為題，包括香港時裝演變的歷程及意義、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普及的因由、港式英語在香港的文化意義、比較港英兩地高等教育的擴展跟女性以及移民的就業成就的關係、海外家庭傭工對本港女性就業的影響，以及在香港小學中性別社教化的情況。另外亦有參與“香港新婦女協進會”有關女性及家庭的研究項目。輯於本書中有關香港青年人英文名字的研究源自日常生活的觀察，是作者最喜愛，但卻因生活迫人而無奈地不可以經常做的“小品式”文化研究。

馮應謙

洋名安東尼，香港出身，加拿大籍，教會學校讀書，美國受高等教育，鄉下報稱是廣東新會，實質不詳（父親少時上海長大，後南下香港），因身份雜亂，便好好利用多重身份從事不同的身份研究和流行文化研究——從香港本土流行文化，到跨國文化企業在中國的本土化均在研究之列。簡單來說，在中國以港人身份出現，在香港以加拿大身份自居，在加拿大就是美國留學畢業生。在扭轉不同身分之餘，也借助比較年輕的外表之特徵，研究年輕人覺得酷的文化。馮應謙現在回歸大學時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有關流行文化和創意媒體課程。

陳韜文

我在2003年秋季到柏克萊大學作訪問學者，每天可以花不少時間在網上瀏覽關於香港的資訊。可能是因為隔洋觀察，又或者注意力較為集中，社會的脈動反而比在港時更覺明顯，當時已經感到市民對特區政府施政普遍的不滿，隱然覺得社會有求變的暗湧。

其後回港，再經沙士一役和二十三條爭議的折騰，香港的社會危機益發深重，山雨欲來的感覺更覺強烈。及至2003年回歸紀念日前一段時期，我覺得七一遊行將是社會危機的爆發，其規模會非比尋常，是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史時刻。由於有此預期，無論是出於研究興趣或是回饋社會的需要，我覺得機不可失，乃想及在當天對遊行人士進行有系統的調查。本研究主要就是根據有關資料而寫成的。

傳媒與社會變遷一向是我研究的一個焦點。在我讀本科的時候，無論是中國、香港、美國，以至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社會變動加速。自己除了隔岸觀察外，對中文運動、保釣運動以至其他社會運動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與，所以對社會運動並不陌生，有時更覺得社會運動是促進社會變革的源頭。

遠在七八十年代交界之際，我做的碩士論文就是以1978年的金禧師生抗爭事件作為個案，探討傳媒的意識形態如何影響有關報道。由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傳媒與香港政治過渡是我研究的主要議題。不過，進入九十年代中以後，我覺得香港在按既定軌跡發展，答案好像已經存在，對研究香港的衝動因而褪減，更多把研究的注意力

轉向全球化下文化移轉的問題、大陸傳媒演變問題和中港台三地傳媒的比較研究。

不過，平地一聲雷，“七一”社會危機的爆發逼使研究者重新審視過往對分析香港的理論典範是否仍然有效，同時要面對香港往何處去的問題。處此關鍵時刻，於我而言，香港因而再次變得“有趣”。本研究是我香港研究再出發的起點。

簡歷：於1986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傳播學博士學位。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曾任該學院院長（系主任）。研究興趣包括國際傳播、文化移轉及政治傳播。曾發表學刊論文及書章多篇。合著的專書有《大眾傳媒與政治過渡：中國軌跡內的香港傳媒》、《過渡期的香港新聞工作者》、《全球媒介事件：香港回歸的新聞戰爭》和《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合編專書有《傳播與社會發展》、《大眾傳播與市場經濟》、《媒介與政治》和《追尋邊界：傳播、國家和文化認同》。先後出任哈佛、牛津和柏克萊大學訪問學人、國際華人傳播學會會長、香港廣播事務管理局委員、新聞訓練委員會委員等職。現任香港廉政公署社區研究委員會召集人、香港報業評議會執委、多份國際傳播學刊編輯委員等職。

潘毅

我的研究興趣離不開草根階級和小寫歷史。從書寫中國女工的故事到香港社區的探索，再到跨境勞工的走訪只是一種越界的嘗試。

我現任職於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學部，研究興趣包括性別、階級和文化研究。著作有“*Becoming Dagongmei: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July, 1999) *The China Journal*; “Opening a Minor Gene of Resistance in Reform China: Dream, Scream and Transgression in a Workplace” (Fall, 2000) *Positions*; “Global Capital, Local Gaze and Social Trauma in China”, *Public Culture* 14(2), 2002; “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8(4), 2003; 和 *Made in China: Factory Women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2005) Duke University Press 等等。

黃洪

我做過青年中心的社工，組織青年人關心社會，也曾是譚耀宗議員辦事處的助理，做政策研究及倡議的工作，後來轉到工聯會做工會及勞工教育的工作。在組織、倡議、教育者的角色中尋尋覓覓，最後還是選擇在大學落腳。

1994年起在城市大學教授社會工作。自2002年再回到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我喜歡教學，學生的成就與成長為我帶來喜悅。作為社會工作教育者，我相信我的主要目標是刺激學生追求社會工作知識的興趣；協助他/她們發展對人及社會有真正的關懷；以及令他/她們有系統及批判性地思考。

我曾接受社會工作以及社會學的訓練，作為一個社會工作者及一個社會學家，我明白到要建立一個更公平及公

義的社會，理論與實踐同樣重要，而且相輔相成。我希望透過不同的應用及行動研究來達到改善社會中貧乏社群生活的目標。我感興趣的研究課題及實踐計劃包括貧窮、社會保障、勞工、社區經濟發展及社區發展。

近年參與的研究課題和著作有 “The Quality of Life of Hong Kong’s Poor Households in the 1990s: Levels of Expenditur, Income Security and Poverty Situation” in *Journal of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pring 2005); “香港邊緣社群社會資本的貧乏”，《香港社會工作學報》，(38)1；《露宿者服務評估研究： 期末服務評估報告》(2004) 及《困局、排斥與出路： 香港“邊緣勞工”性質研究》(2001) 等等。

目錄

作者自述	vii
1. 港式文化研究 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	1
2. 無關痛癢的1974 呂大樂	21
3. 茶餐廳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梁世榮	45
4. 創造不一樣的公共空間： 香港婦女運動發展的空間政治 谷淑美	87
5. 當麥唛遇上文化研究 吳俊雄	115
6. “唔怕生壞命，最怕改錯名”： 香港年輕人的英文名字 陳效能	155

-
- | | |
|--|-----|
| 7. 偶像與香港文化英雄：
解構陳慧琳的歌迷文化
馮應謙 | 175 |
| 8. 港式“人民力量”：
七一的動員形態與民意政治的重構
陳韜文 | 197 |
| 9. 跨境空間：
在中國大陸工作的香港人的階級政治和身份認同
潘毅、黃洪 | 233 |
| 10. 市井國族主義：
重劃大陸與香港的文化版圖
馬傑偉 | 257 |

1

港式文化研究

吳俊雄 馬傑偉 呂大樂

香港的普及文化成為一個認真的研討課題，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本地刊物《文化新潮》、《號外城市雜誌》、《電影雙週刊》、《大特寫》及一些文化團體主催下，來自不同背景的文化人在1979年2月18日於香港藝術中心舉辦了一次一整天的“第一屆香港普及文化研討會”，是為香港普及文化研究的開始。¹ 而普及文化評論也於八十年代開始在本地報刊蓬勃發展起來。² 以一種介入社會，跟群眾對話的研究和寫作態度來分析普及文化，是香港普及文化研究一直以來的特色。

（1991年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了第一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與會者背景不同（冼玉儀與黃霑同枱議論）、學術源流相異（由文本分析講到工業前景），但都着意運用當時較系統和新穎的理念，去分析香港文化與社會的狀況。研討會和其後結集的專書，在學術界引起迴響。不少人認為，它們宣佈了本土文化研究在學術研究機構正式起步（Sinn, 1995）。）

1991年至今，香港文化研究和社會環境經歷百變，學界相關的研究，亦有令人側目的發展。³ 香港文化研究不但成為了大專院校課程的一部份，相關的研討活動更在不同院校活潑起來。